卜弼德先生

一

我第一次見到卜弼德先生 (Peter A. Boodberg) 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剛從愛荷華搬到柏克萊，已經決定那年十月開始在加州大學唸比較文學。十月以前的炎炎長夏必須打發，我住在有海風的北加州，覺得那是很好的安排。陳世驤先生在加大幫我找到一份臨時的研究工作，工作很輕鬆，只要讀書作札記卽可，讀書讀厭時，陳先生要我整理夏濟安先生遺留下來的札記，爲那成千成萬張卡片分類編目。這些工作都沒有時間性，但我每星期必須與陳先生見面一次，提出研究工作的報告，見面地點通常在校園裏的都蘭樓。我第一次見到卜弼德先生便在都蘭樓。

都蘭樓是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房子，樓下是教室，樓上是藏書庫和閱覽室：很安靜典雅，惟一的樓梯並且還是大理石砌成的，欄杆也有雕花，故我們稱之爲「雕欄玉砌」。樓上閱覽室兩側各有一間研究室，是整幢大樓裏最好的兩個研究室，陳先生用西側的一間，卜弼德先生用東側的一間，因爲他們二位是東方語文學系的資深教授；可是西側的不如東側的研究室大，又嫌西晒，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東方語文學系最資深的教授一定是卜弼德先生。

卜弼德先生六十多歲的樣子，圓圓臉上整齊的白髮和他滿面紅光呈一強烈的對比，帶眼鏡，留小髭，也是雪白的；八月的加州天氣微涼，所以他穿得很多，手上還捏着一頂帽子。我和陳先生邊談邊從圖書館走出來，卜弼德先生剛上樓，我一看就知道此人一定是教授，而且一定和中國學問有關。陳先生把我拉到他前面說：「卜弼德教授，這個年輕人是新來的，到柏克萊唸書來的。」「啊你好，」他用一種帶強烈歐洲口音的英文說：「唸甚麼呢？」陳先生說我唸比較文學，卜弼德先生好像鬆了一口氣說：「哦，比較文學，很好！」他的表情很奇怪，我一時猜測不出，意思好像是說，幸虧是比較文學，不是中國文學；又好像是說，幹嗎唸甚麼莫名其妙的比較文學，不唸中國文學？我謹愼地站在那裏沒說話，聽他和陳先生談了一兩件系務，我很喜歡他那種教授派頭，我想我到六十歲也不見得培養得出那種好看的教授派頭；我也很喜歡他強烈的歐洲口音，我總覺得每個人說英文都應該有點口音才夠味

道。

事後陳先生對我說，卜弼德先生是俄國人，即所謂「白俄」，流亡的舊俄世家子弟，中國學問很好，尤其是訓詁小學。陳先生要我將來有機會也去聽他的課，我唯唯，可是心裏想，訓詁學有甚麼聽頭？

開學之後，我以研究生的資格在都蘭樓的閱覽室裏申請到一個保留座位，白天除了上課以外，都消磨在那個座位上。我的座位靠窗，窗外隔了馬路是英文系的大樓，再遠些是總圖書館，更遠是鐘塔和山。我的四年便在那種涼涼的情調裏淌過去了。我選修希臘文的時候，常常就在那個座位上演習詞類變化。有一次正埋首於變化之中，有人走到我身邊說：「希臘文嗎？」我一抬頭見是卜弼德先生，對他恭敬地笑笑，他說：「中國人應該多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說完走向書架去翻書。我聽說卜弼德先生除了俄文，中文，英文之外，又精通許多別的文字，包括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日文，甚至還懂梵文和各式各樣的阿爾泰文字，所以他在西方漢學界是令人著迷的怪傑。他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十四個部首，文以英文爲之，可是他分析諸部首的時候常常使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時是希臘文，拉丁文，有時是俄文，德文。學問不夠好的，文字認識不夠多的，不免覺得這些部首被他越分析越糊塗了；但他說：三千年的中國文字傳統，含涵深遠博大，惟有用整個歐洲文明的三千

年文字傳統，方能注解清楚。

二

陳先生常提醒我，要我有機會選修一門卜弼德先生的訓詁課程，我一方面忙於西洋文學，一方面對甚麼「訓詁」提不起興趣，總是藉故推諉。直到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勢無法再推，又看到楊聯陞先生在一篇文章裏推崇卜弼德先生爲西方漢學界泰斗，乃決定選修一門試試。我挑選了爲「武成」爲我的研究題目，一個學期幾次在堂上口頭報告，先以外證辨「武成」之所以僞，繼以內證分析「武成」的文字內容，這是最麻煩的地方。卜弼德先生要求學生每個字都要分析詳盡，一絲不苟，尤其不可忽略歷代各種字書對一字一辭的說法，要能引用，更要能判斷是非。我翻了一個學期的書，到下筆寫報告那星期，精神幾乎崩潰了，晚上做夢都是「爾雅」和「玉篇」之類的東西。一篇報告寫了四十餘頁，只分析了開頭這幾個字：「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我把初稿給卜弼德先生看，說我如果繼續弄完整篇「武成」，非發瘋不可。他看看初稿已經那麼長了，又看我

精神渙散，笑笑說：「夠了！」我想我自讀中國書以來從未如此苦過。報告打字完畢後，我瞪着它看，一時覺得好佩服那些乾嘉時代的小學家。

卜弼德先生把我嘔心瀝血的「武成研究」壓了好久不還，有一天在都蘭樓看到他，他忽然說：「你來，你的報告可以還給你了。」一邊開研究室門時，他又說：「中國人學習希臘文很好。聽說你也學習古英文，那也很好。」我一看我的報告，原來已經被他老人家批得體無完膚了。他有時用英文批，有時用中文批，我注意到他的中國字寫得龍飛鳳舞，比所有我認識的西方漢學家都寫得好，很有中國老人筆下的沉着趣味。我們坐下討論了半天，他的批評我有好多地方不同意，可是辯不過他，因爲他引證豐富，歷歷在目，我也無可如何。有了這次經驗後，我以我的鄉下人脾氣判斷，覺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對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們唸比較文學的並不是完全不理中國的文字小學。不久我的博士考試委員會籌備成立，通常考生對委員會的名單也可以出意見，我對陳世驤先生說，我要請卜弼德先生考我一門，陳先生聽了以後，沉吟良久，最後說：「好吧，年輕人總得闖一闖。」我那時完全是因爲好勝的關係，打算硬碰硬試試看。

博士考試由六位教授主持，三位中國文學教授，三位英國文學教授；先考筆試，陸陸續續考了五個星期，通過之後考口試，每位教授問半小時，共三小時。卜弼德先生最資深，

所以口試一開始就由他問。他點上一支雪茄烟，不慌不忙地說：「劉勰說屈原賦『金相玉式』，甚麼意思？」我記得我在筆試裏寫過這個問題，好像說，如果以現代詞彙來解釋，相可能是內容，式可能是形式——這時他在口試裏提起，一定是他不同意了。然而也不得不硬着頭皮複述一遍。他聽我如此固執成見，頻頻搖頭，我又緊張又生氣，只好反問他；他說：「相字明明是以目視木，說文裏寫得清清楚楚，如何是內容？」我一時語塞，惶恐不已，只好說劉勰用字或可能受翻譯佛經的影響，惟不知佛經用「相」字到底是何意義。卜弼德先生一聽更加生氣，他說：「劉勰用典應該來自大雅棫樸！」我無奈只好頂撞說：「大雅棫樸只道『金玉其相』，並未說『金相玉式』，難道先生以爲式是內容嗎？」這顯然是我技窮胡說，他氣得不得了。這時英文系的教授覺到空氣不對，出來打圓場，藉故三十分鐘已到，應該轉變題目了，才幫我解了圍。

口試居然通過，我頗覺意外；但我想無論如何，至多是五比一通過，絕無全票通過之理。我心中悻悻然良久，頗爲慚愧。覺得這個臉實在丟大了，非努力雪恥不可。不久博士論文委員會又要成立了，陳世驤先生任主席，另需兩位評審委員，我對陳先生說，西洋文學方面請希臘文學的教授，中國文學方面請卜弼德先生。陳先生瞪大眼睛說：「你可眞是不死心！」我問他爲何驚訝，陳先生這時終於說明，原來卜弼德先生一向對於所謂比較文學十分

不以爲然，認爲那是不成其爲學問的東西。我雖然覺得奇怪，但也未嘗過份震驚，因爲我所遇見的學者當中不只卜弼德先生如此，在這以前，教我喬叟詩的英文系教授馬士卡定先生（Charles Muscatine）也討厭比較文學，而馬士卡定先生的成名作「喬叟與法國傳統」可以說是一本貨眞價實的比較文學大著作。更進一步說，卜弼德先生的訓詁學，根本就可以稱爲「比較訓詁學」。他之討厭比較文學和馬士卡定先生之討厭比較文學可能是同樣的道理，也許只是偏見，更可能是覺得，一個人只要學好中國文學或英國文學就行了，何必巧立名目去「比較」呢？我聽陳先生說明以後，更想向卜弼德先生「挑戰」，最後陳先生只好同意我請卜弼德先生擔任我的論文評審委員。我親自去請，他笑笑地答應，但他說，「我只審查你詩經方面的材料和理論，歐洲文學方面的我不管。」

一九七〇年冬天我把論文全稿寄交卜弼德先生，他又積壓良久，最後終於寄回來了，這次批得較少，又附有一封長信，綠墨水寫的長信，其中稱讚我的「想像力」和「創意」——我想這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恭維——最後說：「讀完你的論文，我總算相信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可以研究的學問。」這句話使我覺得非常高興，覺得他終於接受了我的態度和方法，不再以爲我只是一個胡來的小子了。後來有人告訴我，卜弼德先生數十年來極少寫那麼長的信；但那人又說，他用綠墨水寫，是因爲要使那長信自動消滅，因爲綠墨水不能複印，而且

容易褪色，有朝一日，他在這信上講的話都會烟消雲散，等於沒講。我聽完之後，不禁爲之惘然良久。

一九七一年五月，陳世驤先生逝世，我回到柏克萊參加追思會，見到卜弼德先生。他非常傷心，身體也顯得很虛弱。他對我說，陳先生到加大教書是他請去的。趙元任先生也是他請去的；他又說，抗戰勝利那年他曾寫信到昆明請聞一多先生去加大教楚辭，聞先生以「北方的青年需要我」爲理由未就加大之職，不久就死了。我想一個西洋人主持東方語文學系，能夠禮聘聞先生，趙先生，陳先生這樣的中國學者，已經足可以證明他的眼光和胸襟了。追思會快完的時候，好多親友和學生都在哭，卜弼德先生也哭了。他忽然抱住我的肩膀說：「我覺得我很老了，今年秋天我就退休了。你在柏克萊的時候，我對你很嚴厲，因爲我要你知道，詩人是詩人，學者是學者，詩人要變成學者，需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我很高興你能一再找我，不怕我對你的苛刻。中國文學還是要你們中國人努力去開拓，中國人讀點西洋文學是好的。」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說：「你的希臘文不要放棄。」會散之後，他擦乾眼淚對我說：「你是一個有價值的學生。」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卜弼德先生，因爲第二年六月他也過世了。那時我在西雅圖，但我沒有去參加追思會，因爲我好像已經很怕參加追思會了。九月間我去柏克萊上陳先生的墳，看到卜弼德先生的新墳就在陳先生鄰近，秋陽之下，樹葉蕭

瑟，我在兩位老師的墳前沉思，哀傷良久；我注意到卜弼德先生跟前竟無鮮花，乃把原已插在陳先生跟前的康乃馨分出一半給他。兩位老師生前是好朋友，大概不會怪我荒唐吧！

三

卜弼德先生以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生於蘇俄海參威，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死於美國柏克萊，享年六十九歲。他的家譜可以一直推到中世紀一〇〇三年。十三世紀時，他的祖先自馬恩玆（Mainz）遷徙到愛思脫尼亞（Estonia）；迨一七二一年，帝俄彼得大帝在巴羅的海「開天窗」，併吞了愛思脫尼亞，卜氏家族乃成俄國人。卜氏是武士世家，一直到二十世紀都維持其軍人家風的傳統。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卜弼德先生適在聖彼德堡一軍校爲入伍生，據說他自少年時代即善記憶，對世界各國的軍艦種類噸位如數家珍。一九一五年，俄羅斯動亂擴大，他回到遠東，不久被送到哈爾濱避難；卜氏歷代是貴族軍人，當然不容於共產黨。卜弼德先生在哈爾濱上中學，放棄了軍事，改習語文，並開始學中文；不久又回到海參威。共產黨的紅軍勢力到達海參威時，他離開俄國，變成一名流浪的「白俄」。一九二〇年夏天卜弼德先生到了舊金山，四年後自柏克萊的加州大學畢業，獲東方語文學學士；又六年，獲博士學位，即留校

任教，由講師，助教授，副教授，而於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前此他從一九四〇年開始卽以副教授身份任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直到六十年代初期膺任講座教授時才卸任。上文所述三位中國學者接到加大聘書時，正是卜弼德先生擔任系主任的時代。

卜弼德先生在西方漢學界以博學深邃著名，他的論文每一篇都提出新意見，不講廢話，所以讀起來很吃力，更因爲他懂的文字太多，引證的範圍太廣，有時甚至連行家也都覺得難以了解。他講課也極少閒話，更無廢話，針針見血，有時思想是跳躍的，從一個地方跳到另外一個地方，往往使我覺得好像是在和禪宗和尙談問題。你問他「黃鳥于飛」的「于」字怎麼解，他說：「于以采蘩」的「于」極可能是個動詞，說完了就不接下去了；你只好自己去想：如果「于以采蘩」的「于」是動詞，難道「黃鳥于飛」的「于」也是動詞嗎？這樣纏來纏去，腦筋不靈活的學生根本無法理解，可是我想教學的「啓發性」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卜弼德先生一九三〇年起卽在柏克萊講授漢學，開山比許多人早，於時間上屬於高本漢那一輩的人物，所以他的及門和私淑弟子特別多，在美國漢學界，所謂「卜派」（Boodbergian）漢學已經成爲一種特殊的學術風尙，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卜派漢學家講究對於中國古典（尤其是唐朝以前的文史哲典籍）的絕對把握，於字彙和辭句的質理做徹底的了解，不苟且，不放鬆，追索文字的源頭，分析文字的發展，凡事以歷代字書的證據爲依歸，輔之以西

方文字訓詁學的知識，不惜與現實中國社會的傳承相違背。卜派漢學的優點在承認隋唐以前已經成立的書籍的權威，把「漢學」當做是一種直指古典的探索，因此破除許多初學者偷機取巧避免古典的機會，強迫他們鑽研那些連中國人都覺得疲倦的故紙。卜派漢學的缺點是過分抹殺隋唐以後中國人自身對於中國學術的詮釋，尤其否定宋明以後逐漸定型的傳承，更認爲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者完全不顧祖宗的心法和技術，認爲現代中國學者的努力只算是世界漢學之一支，而甚至是比較低劣的一支。卜派漢學家之所以有此偏見（我個人認爲那是他們的偏見），想必是因爲他們文化史的現實加諸於他們的一種心理負擔。西方文化亡於羅馬帝國之瓦解，希臘和拉丁的傳統一朝泯滅，只能等到文藝復興時代才回頭，痛悔黑暗時代之愚昧，所以希臘文和拉丁文是死文字，不是活文字。西方人認爲今天的希臘人不懂荷馬和柏拉圖，意大利人也不懂味吉爾和西塞羅，只有立志窮經的人才懂，而立志窮經且有所得的往往不是希臘人或意大利人，反而是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卜派漢學家以此心情證諸中國傳統，產生了一個錯覺，認爲中國文化或亡於五代（證之於敦煌之埋沒），或亡於元朝（證之於儒者之陵夷），因此也必須有一個「黑暗時代」，而這黑暗時代結束於乾嘉之朝，若斷若續，可惜這個「文藝復興」再度粉碎於五四，於疑古，於疑古之餘孽，甚至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於批孔運動。卜派漢學家的心情可以了解，可是他們的錯誤只在一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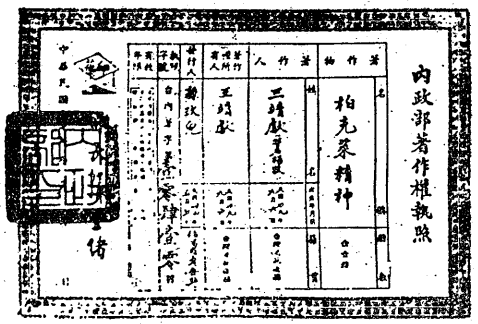
們斷定中國文化史裏非有一個「黑暗時代」不可，他們不知道中國學術人物中抱負「爲萬世繼絕學」的，可謂數十倍於歐洲的學術人物——中國的學術沒有斷過，未曾死過；今天的中國人不是希臘人，不是意大利人。卜派漢學家錯以爲中國文化中斷過。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前進或許緩慢——今天的學者尤其緩慢——可是他們並沒有死，中國文化也沒有死，不會死。

以功比過，卜派學者之功遠勝於過。卜弼德先生對西方近代漢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最大的成就乃是一種學風的建立，而對於一個讀書人而言，再也沒有任何事比建立純正的學風更值得驕傲的了。卜派學者要求西方漢學家自己把中國古典看懂，這種簡單的道理，意味着一種觀念的革命，因爲二十世紀初葉的西方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大多以爲談論中國學問不難，只要雇傭幾個中國助手做逐譯解釋的工作，他們便可以用英文或法文或德文滔滔不絕地寫作，儼然成爲專家。卜弼德先生稱這種現象爲西方人的「語言的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他認爲這種帝國主義彷彿軍事，商業，宗教三者結合的帝國主義，因爲這些都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挾其似是而非的優越感所加諸於中國文明的侮辱。在這種帝國主義裏，所謂專家正如衣冠整潔的非洲探險家，他的中國助手乃如馱運行李的黑人土著，興致來時，邁向神秘的「原始森林」！卜派學者鄙視這種「專家」，他們覬覦業於中國古

典，表示他們對中國文明的起碼敬意，他們提倡「把書看懂」，等於是對於那些「專家」的撻伐，強迫那些目不識丁的中國通閉嘴。美國近二十年漢學的進步，卜弼德先生之功誠不可沒。

卜弼德先生不是多話的人，但他是一位堅持原則的眞正的學者。他晚年心情消極，好像對學問之爲物不太相信了，據說臨終曾命令她的女兒將遺稿付之一炬。幸虧她的女兒比杜牧的姪子明理，未遵其遺命燬稿，否則子車從穆公死，過在康公。卜弼德先生是俄羅斯武士世家的子弟，他少年時代曾立志爲刺客，想俟機暗殺史達林，爲沙皇和千千萬萬俄國人民復仇，後來大概見事情不可爲，只得放棄了。

（一九七六・一）



柏克萊精神

洪範文學叢書⑩

著者：楊牧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廈門街一〇八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電話：三九二七五七七
郵政劃撥：一〇七四〇二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
二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三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
四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五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六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缺頁、破損、裝訂誤錯，請寄回調換）

定價80元

柏克萊

——懷念陳世驤先生

1

一九六五年夏天，是我來美國以後的第一個暑假，那時我還是愛荷華大學詩創作班的學生；暑假到了，不免也和其他中西部大學的中國學生一樣，向東西兩岸搬移，目的是打工掙下一年的學費生活費。我先在紐約胡混了兩星期，工沒找到，換得一身疲憊；不久安格爾先生(Paul Engle)通知我，創作班決定繼續頒我一年獎學金，勸我不如回校讀暑期課程，免得因找工影響情緒，違背了讀書和寫作的初衷。我一斟酌，反正下年學費生活費不成問題，就匆匆回到愛荷華；住不了幾天，又開始發悶，乃決定和少聰一同西出洛磯山，到加州去。

少聰去加州，是爲了在史坦福大學的暑期學校教中文，所以她住在史坦福大學的校園裏。我去加州，師出無名，幸虧前此林以亮約聶華苓譯書，聶華苓事情忙，嫌譯書太麻煩，竟把我轉薦給林以亮，代替她自己的譯書作業。林以亮竟也贊同，並且來信把報酬數目向我解釋了一下；我估量，如果好好做，光是譯書，掙的錢並不少於洗碗托盤子，就非常乾脆地接受了下來。我住在柏克萊芭柯街，同屋的有東海物理系的同學陳敏，我每天除了譯書，就是寫詩寫散文，散步喝咖啡，並專心精讀葉慈全集，週末輒渡海去史坦福找少聰，生活非常閒適。後來譯成論文數篇，和張愛玲、於梨華、林以亮三人的成果合爲一本書，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叫做「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這一次去柏克萊，是我生命的轉捩，因爲就在六月間，我第一次和先師陳世驤先生見面。現在回憶這事，覺得悲傷快樂而遙遠——我相信「悲傷快樂而遙遠」這樣修辭含混的話，也只有陳先生完全懂得。我能記憶如何走過長長的咖啡店林立的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楓葉翠綠，陽光滿地，吉他的聲音，民歌的吟唱，鐘響，鴿飛，水流，犬躍。當時我怎麼樣都沒想到一次短短的談話，竟決定了我未來四年的學業模型，甚至挑明了我的心向，改塑了我的性格，從此決定了我一生必要走的路。

我初到柏克萊，就聽人說到陳先生的種種。朋友們提到他，最大的印象是「嚴峻」兩個字。

其時夏濟安先生在柏克萊去世不及四個月，我也聽說陳先生的心情很壞，追念着故友。種種原因，使我一開始並未特別意願去拜訪他——當時我大概是這樣想的：我是寫詩的，又不是弄學問的；即使見了面，又談些什麼好呢？但我又確切地記得曾在「文學雜誌」上讀到幾篇他在臺灣大學的演講稿，記得他似乎是唯一能在論中國古典詩的時候，左右逢源地引證轉述西方文學理論的學者；而且我還記得，他似乎是唯一再三強調新詩在中國文學的正統地位的大學文科教授。這在當時，是使寫詩的朋友感動的。不久我的老師徐復觀先生從東海大學來信說，既然到了柏克萊，不可錯過一見陳先生。徐先生和陳先生的交往始於有關文心雕龍的討論，此後許多年，每當我在文學的題目裏寫信向徐先生問疑時，他總在回答以後附加一句：「如果陳先生的解釋與我不同，宜從陳先生。」我追隨徐先生讀書多年，深知他品評學術人物的標準和脾氣，能受他推崇如此的，似乎很難找到第二人。

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給陳先生，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並提及「我是徐復觀先生的學生」，以爲自己壯膽。陳先生聲音宏亮，但聽得出有些疲倦甚至不耐煩，直到我提及徐先生以後，他才說：「這樣好了，明天上午十一點你到辦公室來見見面吧！」我猜想當時二十五歲的我並不十分快樂，納悶了一場，甚至想臨陣脫逃，不見也罷。後來過了幾年，我在他面前又提到這件事，他大笑說：實在是一方面常接到無謂要求晤面的電話，二方面夏濟安先生剛去世，心情惡

劣，說話的口氣聲音都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總之，第二天我終於還是一路問到了加州大學的東方語文學系，爬上了大理石梯，按時站在他的辦公室前，敲門，但陳先生也終於遲到。此時我眞覺得比張良還委曲，手中捧着兩本自己的詩集，覺得好無聊。過了幾分鐘，陳先生終於上樓來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記得並沒有爲遲到表示歉意。我被讓進辦公室，坐在書桌前，又謙遜了一場，雙手把一本「水之湄」一本「花季」捧上。他隨便看了一眼詩集的封面，擺在一邊，一逕拆讀剛才手上抓的那把信，不發一語，把我扔在一邊發愣。此時，我張良之情又不禁油然而生，竭力壓抑着自己，隨便瀏覽他滿牆壁的線裝書。這是我到美國一年內所看到的最多的一屋子線裝書，後來才知道，是半部「四部叢刋」，另一半放在家裏的書房內。在學校的是子集，在家的是經史。四年多的時光裏，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他爲何如此割裂。

他讀完信，匆匆拾起詩集，仍然不發一語，專心讀了好幾十頁，忽然臉上有了新的表情；說了些稱讚的話。我受了鼓勵，心情好了些，膽子也大了，就說些寫詩的抱負和在愛荷華的情形。他說：「新詩是必然的，歷史的必然！」我即刻印證了過去從「文學雜誌」裏得到的關於陳先生論近代文學的印象。事實上，一九六六年他在京都大學講學，竟隨身帶了「花季」和「水之湄」而且以之示京都大學的漢學教授小川環樹先生。後來他常笑着對我說：「靖獻，你在日本的第一位讀者是當今日本最少壯的權威漢學家小川環樹！」在我寫詩的生涯裏，能有陳先生這樣長輩的

知音，無寧是奇蹟。後來他開始問我，愛荷華詩創作班以後打算幹嗎？我答稱有意讀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你說說看心裏有什麼課目想研究？」我乃開口大講自己對史詩和悲劇的看法；這時，陳先生已經變成一位笑容滿面的長者，快意地吸着板烟，不時大聲地追問我的論斷，又引述中西材料爲我的暢言做證修改，最後說：「史詩和悲劇在中國文學傳統裏不曾發展成型，正是我數十年來時時思考的題目。」

「這是比較文學的大題目！」他說：「你在愛荷華畢業後，願不願到柏克萊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2

此時已過正午，陳先生在都蘭樓（Durant）的辦公室惟一的大窗是朝西的，陽光居然也透過百葉窗灑了進來。窗外看得見生物大樓的長廊和雕刻，廣大的草地錯落植着松柏和紅檜。今年五月二十三日近午夜，陳先生在柏克萊以心臟病猝發逝世，同門松棻（這是陳先生最愛的兩個字）自醫院打電話來，跨過一個美洲大陸，麻薩諸塞已經是二十四日的凌晨兩點半，我和少聰夢中驚醒，猶疑是夢。三點半，夏志清先生又自紐約打電話來，此時我已完全清醒，乃決定天亮了就求購機票，飛加州爲恩師奔喪。

暑假結束，我和少聰仍然越過許多兀自新奇的山水，回到愛荷華大學。我依然在詩創作班，但選課的安排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年在愛荷華，除了詩和翻譯，我只規規矩矩地選了一門藝術史和一門古英文，死記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法；如今爲了將來讀比較文學，除了詩和翻譯，仍繼續念古英文，選專書「貝爾武夫」(Beowulf)，修德文，並且選了愛荷華比較文學系的研究討論課程「比較文學的問題」。從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暑假，保持一月至少一信的記錄，向陳先生報告求學的進展。冬天，向四個學校發出申請入學許可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信，心目中只有耶魯、普靈斯頓、哈佛、和柏克萊的加州大學。多尾，在雪封的愛荷華通過考試和論文，於一九六六年二月間獲得藝術碩士的學位。四月，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各來信，給了我入學許可，同時愛荷華大學的比較文學系也給我入學許可和一筆兩三倍優厚於加州大學的獎學金，我寫信問陳先生，他從京都來信：「放棄哈佛，到柏克萊來！」我於是寫信給哈佛的研究院，告訴他們：「我決定去柏克萊的加里佛尼亞大學。」

離開愛荷華是一次很感傷的經驗，我和少聰在那小城裏住了近兩年，有很多可親的朋友，尤其是聶華苓和她的兩個女兒薇薇和藍藍。我因爲是二月得的學位，無形中空出了一個無聊的學期，只好繼續註册，每天除了啃德文和十八世紀歐洲文學，只能寫詩寫散文，就在這期間譯了西班牙詩人羅爾卡 (F. Garcia Lorca) 的「浪人吟」，但太半的冬末和春天都到田裏去看玉米，

到聶華苓家喝啤酒吃炸醬麵，沒事就纏着劉國松，要他送幾張棉紙給我畫畫他那種摘疙瘩的現代畫，否則就和王敬羲吵架。

五月底我們開車橫越美國的大西部；七月，陳先生和師母自日本回加州；九月，陳先生代表少聰的父親主持我們的婚禮。十月開學，我們住在離加州大學校園很近的小公寓裏，屋外有巨大的楓榆，從此開始我在柏克萊的學生生活。陳先生家在北面的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樓房，松樹環繞，他的朋友陳穎名之曰「六松山莊」。這六松山莊是我四年半裏狂笑揮淚痛飲的地方，也是沉思筆記辯論的地方，就在這六松山莊裏，我學到各種課室裏闕如的古典和生命，我窺見學術的神奇，掌握到一點點的詩經和楚辭，掌握到一點點的樂府和唐詩——我只能掌握這一點點，因爲更多的時光裏，我追尋的是一種純粹的人性的關注，一種愛，一種活力。我只能掌握這一點點，因爲有一天我也必須離開六松山莊，必須也煞有介事地站在講壇上做起洋人的先生來。

陳先生是我在比較文學系的指導教授。我選課的三年裏，除了跟他讀詩、騷、文心雕龍、唐詩以外，並在他的鼓勵和批准下繼續研究中世紀英國文學，去和英文系的研究生比較長短。一九六七年，通過德文考試後，開始選修日文和希臘文。我選修希臘文時，已經超過二十六歲，這在西方是巨大的冒險，因爲一般有教養的西方人總在二十歲以前甚至十歲左右就開始學希臘文；但我讀了兩年以後，興趣驟增，對古希臘文學產生狂熱的興趣，幾乎到了捨棄英國文學，專攻希臘

文學的地步。爲此我跑去和陳先生商量，他一邊敲着烟斗笑着說：「靖獻，生也有涯……」最後我決定暫時放棄希臘文，仍以古代英國文學和先秦中國文學爲研究範圍。最近這一兩年，我常常懷疑當初這個決定到底是對是錯，仍不得而知。有時很後悔那時沒有繼續深入荷馬，有時又覺得「知也無涯」，也許陳先生當時的話，眞是透過種種考慮以後的唯一出路。陳先生是好勝的，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然則他要我暫時放棄希臘文的時候，心裏想的是什麼呢？也無非是恐怕我跌撞失落於美國式的學院吧？他最了解我的狂傲和衝動。數不清有多少次，在他的板烟裊裊間，我突然發現我也溫順得像一個中文系的呆瓜。但也幸虧這種溫暖的空氣包圍着我，使我逐漸從粗魯的二十五歲邁向規矩多慮的三十歲。「詩教」是眞的存在的，所謂「溫柔敦厚」，在我從陳先生細讀詩經以前，只是模糊的箴言，後來許多午後和黃昏，在都蘭樓的課室裏，在他西曬的辦公室，在他家裏的客廳，安靜地討論詩如何興，如何觀，如何羣，如何怨；我方才明白爲什麼孔子說：「小子何莫學乎詩……」

中國古典文學本來就是存在的，但隨着各人觀察古典文學的態度底不同，它存在的面目也不同。在國內讀古典文學直覺地以它爲「舊文學」，直到遇見陳先生，我才了悟三千年前的詩騷箴言也都永恒地「其命維新」。仲子的情人低低的懇求和恐懼，是三千年不變的中國女孩對愛情的欲求和顧慮；赫赫南仲部隊裏一名下級軍官的抱怨和歎息，又何嘗不能說明今天許多征人的心

情？通過各種文學理論的實驗和證明，陳先生使我認識另一面的文學趣味：文學並不是經籍，因爲它要求我們蓄意地還原，把雕板的方塊字還原到永恒生命，到民間，到獨特的個人，然後，指向普遍的眞理。也只有在這縝密還原的功夫以後，我們才能斷定文學也有某種普遍的眞理。柏克萊的四年餘，我無時不在追求這種藝術的境界，設法出入古代英國和中國的文學，在陳先生的鼓勵和監督下，互相印證兩種文化背景和美學標準下的產物，追求先民在啓齒發言剎那間，必然流露的共通性。

這麼許多年來，我一直無法完全相信，我當初幼稚的關於文學創作和研究的幻想，會在柏克萊獲得四年餘沉實有力的導引。和陳先生在一起談話，他總先讓我乖戾地馳騁我對文學的看法，一首詩，一個事件，一項公案——他總先聽我比手劃脚地說上半小時，只在面前吸着板烟，印證字句，點頭；等我講完了，講累了，而且越講越心虛了，他才開始重新爲我理出一個頭緒來，分門別類，一點一滴把我的思路扶正，修改謬誤，擴大，刪減，順着我的粗枝大葉仔細地爬梳，使我能下筆寫文章，不致顚倒仆落，顧此失彼。他常說他許多早年的興趣，許久遺忘了，竟在我的身上重新燃起，所以他對我的學業督促總不遺餘力，鞭策磨礪，以爲我或許可以繼承他的文學研究於萬一。這些，我竟然也還是沒有把握的。今年春天，我忽興重新探索「胡笳十八拍」的念頭，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收集資料時，獨缺一本現代學者關於蔡文姬的討論集。五月二十四奔喪加

州，喪事完畢後，曾回加大的東方圖書館查借這書，發現書不在架上，管理人覆查檔案，苦笑地對我說：「陳教授借走了，已經借了好多年。」

3

距一九一二年生於河北，陳先生享年僅五十九歲，這在現代是極端短暫的；是以噩耗傳出，他的朋友和學生都不能置信。尤其因爲他逝世前毫無預兆，更使人茫然哀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陳先生還親手在花園造短籬，當晚在他的美國學生 John Jamieson（加州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家吃飯，喝了許多酒，對短籬之成，非常自豪。陳先生很能喝酒，一九六六年他從京都回柏克萊，是我第一次在六松山莊聆誨的經驗：他進了門，行裝甫卸，就問我：「靖獻，能喝酒嗎？」我答稱「可以」，他很高興地說：「那很好，能喝酒很好！」後來每次在家，談話說文析詩，一過了下午五點，我都要爲他倒酒，很少例外。但陳先生有個規矩，下午五點以前是不喝酒的。在柏克萊四年餘，國內詩人朋友路過加州，我總陪他們上山拜訪陳先生，每次也都喝酒。這些路過的朋友包括瘂弦、鄭愁予、商禽、余光中等，甚至不太喝酒的光中也是一杯在手，侃侃而談；愁予則每次都喝得面紅耳赤，語驚四座——陳先生非常喜歡詩人，尤其是寫好詩的詩人，他曾說：「詩寫得好的，做什麼事都做得好！」這種論斷，使寫詩的朋友不免常感到飄飄然。

陳先生早年是北京大學詩人羣裏的批評家，他最要好的朋友中包括許多現代文學史裏最響亮的名字；他常說：「朋友們都寫詩，寫得那麼好，我想：寫詩大概是寫不過他們的，但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可以品評他們的作品，我可以翻譯他們的作品，使他們的讀者增加。」一九三六年他的「中國現代詩選」在倫敦出版，這可能是中國新詩第一次英譯的結集。他自己北大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戰軍興，南下長沙，在湖南大學教英國文學，旋出國留學於劍橋大學，又渡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不久轉柏克萊的加州大學。將近三十年的光陰都獻給了加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育。他自己也逐漸從新詩的創作和評論轉向古典文學的探索，但懷舊的情緒不時產生，常對學生說北大時代飲酒賦詩的掌故。由於三十年社會生活的隔離，他對中國的感念從強烈趨於陌生，這種現象一直到他結交到一位才性一等的朋友的時候，纔完全改善了過來。這位朋友就是夏濟安先生，陳先生常說：「濟安復甦了我對中國的了解，他爲我銜接了一段我自己不曾參予的歷史，」夏先生猝然去世，陳先生的悲傷是超乎一切無可形容的。他把夏先生當兄弟。在至少五年的時光裏，他們是事業的搭擋，也是談天、說笑、飲酒、打牌，一切一切的搭擋。夏先生的逝世，對他是莫大的打擊。這次陳先生又突然離去，夏志清先生在信上說：「世驥去世，實在想不到。驚訝之餘，感慨頗多。他一直待我像他弟弟一樣，他走了，使我更寂寞。」

陳先生的逝世，使許多別人也覺得寂寞，經驗到他失去夏濟安先生時的心情。對於我們做學

生的，彷徨之感，更是不能道盡。他對學生之關切，時常超乎學業的範圍；現在想來，他的猝然棄世，何嘗與過份勞累過份憂慮無關呢？陳先生對我們，一如父親對子女；他給我們一切自由發展的機會，但也時時警惕我們，他要我們先在學術上站住脚，做一個有內容有見解有骨氣的中國人。他常說：有些外國漢學家是不錯的，但中國文學的拓寬和深入，仍有待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誠意和功力！他也常說：有些所謂的漢學家一知半解，說話大言不慚，其實這種人眞是中國人所謂的「色厲內荏」；逢到這種外國人胡言亂語，弄扭中國文化的時候，我們惟一的辦法，就是「打」！陳先生每次開會都難免要生氣，因爲他聽不慣一些「大漢學家」的論調，總要吵架，爲中國文學的精義辯駁，爭論。他的學生很多，分散全美各大學校，有許多都早當了正教授，系主任了，一般的學生都敬他，也怕他。他上課非常嚴格，學生準備不充份的，總是戰戰兢兢；他教唐詩，一定要求學生背誦，美國學生最怕背誦，但數十年如一日，在柏克萊選唐詩的學生非背得十餘首五七律絕，是取不到學分的。

他對我的學業做人種種，要求也非常嚴格。我在柏克萊三年以後，沉浸於先秦的文學，有一段時期詩也寫得少了；他憂心忡忡地說：「詩也得寫啊！不要荒廢了寫詩；我常怕你完全走進研究的路子，那就太可惜了。」有一次他說：「我眞怕你走了陳夢家的路。夢家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你們性格很像。夢家後來都不寫詩了，跑去搞甲骨文搞先秦，你可別也走起這條路才好！」我

有了新作品，大抵都請他詁定；陳先生讀現代詩，帶着讀古典的誠意和耐心。關於新詩難懂的問題，他說：「其實舊詩又何嘗易懂？杜甫的秋興，義山的無題，也都要下功夫才摸得着意思。我們讀新詩，爲什麼不可以也下同樣的功夫呢？」有次在家喝酒，他對着愁予和五六個朋友分析愁予的作品，事後愁予說，學者談新詩，陳先生是「天下第一人」！但陳先生並不是非「廟堂文學」不讀的。他和夏濟安先生一樣，是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忠實讀者，他曾經狂草寫了「雪山飛狐」裏的一首引詩送給我們，接尾兩句是：「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

陳先生對自己的寫作要求非常嚴格，他常說，一篇文章若是沒有值得讓別人共享的發明，便不必寫它。他的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牽涉到文史哲的各種問題。除了中西古典的探索以外，其中最令我們驚訝的是一篇關於「唯在主義」的研究。此文發表於一九四八年北平出版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所謂「唯在主義」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存在主義」；「唯在」乃是相對於「唯心」「唯物」而言的。這篇文章可能是中國思想界最早談論存在主義的文章之一。陳先生過世以後，我受陳師母，夏志清先生和楊聯陞先生的督促，負責搜輯他的中文遺著成書，六月中在康乃爾大學影印得這篇以「陳石湘」筆名發表的文章，隨即給張系國看。系國正在弄現代哲學，他看完了說：「就是現在許多搞存在主義的人，也寫不出像這篇二十多年前的東西週密精采的文章。」陳先生的中文著作可望年內在國內結集出版；他的英文著作五六倍浩瀚於中文著作，正由

加州大學的 Cyril Birch 教授整理中，不久也將由加州大學出版部印行。陳先生生前常說，寫論文是好的，但出書不好，言下怕的是落入文字障。他的朋友和學生總不斷勸他結集出書，他也總是一再推辭。現在他已經去到一個清明朗靜的世界了，安息了，不必再憂慮魔障了，也不必再生氣了——他的朋友悲傷之餘，奮發起來爲他印書，以陳先生的熱誠坦蕩，大約是不再堅持反對的了！

現在回憶起來，陳先生憂慮的事情太多了，他把自己累倒了。我彷彿可以看到他一手握着烟斗，皺着眉頭思考做決斷時的樣子。他是一位濃髮濃眉的北方人，皺紋很多，痣很多；初識的人總畏懼他，但據說他卻是同輩朋友中最放任最隨便的人，他是朋友中的詩人。陳先生對他的長輩也最有禮貌。在我們學生面前提到前輩人物的時候，他從不直呼其名，總用「先生」二字；他提到胡適之，一定說「胡先生」；提到周作人，說「周先生」；提到趙元任，說「趙先生」；提到顧孟餘，說「顧先生」。久而久之，我們也都習慣地知道他的所指了。提到同輩時，他的作風是直呼名號，如聯陞、志清、復觀、濟安——這在我們從臺灣出來的學生的印象裏也是溫馨而具有教育意味的經驗。他對晚輩的關照提携可謂不遺餘力。記得一九六九年五月我考博士口試前夜，輾轉難眠，考過以後，陳師母偷偷對我說：「昨晚上老師也睡不着覺，我問他，爲什麼睡不着，他說：明天一早你要考口試；我說是靖獻被考，又不是你被考，你爲什麼睡不着，他也說不出個

道理來。」陳先生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病發以後，昏迷了近十小時，當中醒了一會，來不及交代遺言，卻喃喃念着兩個學生的名字。他對 John Jamieson 說：她們的碩士考試和博士論文怎麼辦？陳先生知道他的病很嚴重，但即使在這一刻，他最關心的也還是學生，難怪他逝世的消息傳出以後，鄭清茂去爲他代課教詞選，班上的學生坐在教室裏哭泣，拒絕上課。學生說，不上課了，我們要回家去，到圖書館去，把我們最亏歡的詞譯成英文，輯印成册，紀念陳先生。

去年八月中，我和少聰離開柏克萊，開車來麻省教書。臨行上山辭別，白花花的太陽，松樹蒼翠，陳先生取出珍藏的高麗人參酒，斟了兩杯，命我喝了其中一杯。陳師母和少聰已經淚眼婆娑了。今年春天，華盛頓大學來聘，四月十五我飛西雅圖與華大的教授先生見面，忽興南下加州之想，十八日到了柏克萊，即與清茂驅車上山，與陳先生在暮靄夜色裏把酒談了六七小時，這竟是我與陳先生見面談話的最後一次。記得那天他提到許多暑假回臺灣的計劃，再三表示希望能和詩人們見見面。五月底，噩耗傳來，奔喪期間，陳師母責令我整理陳先生的遺物。走進樓下的書房，看到熟悉的滿壁圖書，牆上豐子愷的畫，桑他耶那的照片，不禁非常傷感。書桌上擺了兩張飛機票，一張到檀香山，一張到香港轉臺灣。啓程日子是六月六日，離去世都天，也只不過是兩個星期罷了。陳先生去年夏天回臺，遊花蓮，對花蓮的民風和山水大爲讚賞，酒後曾對家父說，

加大退休以後，或可以遷居花蓮，辦個小學校，享受他的晚年，從三十年海外飄泊的風塵中安定下來。花蓮是我的家鄉，山水有知，當也和我一樣的悲悼。

一九七一　選自傳統的與現代的

楊牧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3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楊牧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華風彩色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一巷六弄廿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定價：精裝：七〇元
平裝：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再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